

文化与民主



CSSCI 来源集刊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
八
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化与民主

CSSCI 来源集刊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
八
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与民主/郭定平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复旦政治学评论; 8)

ISBN 978 - 7 - 208 - 09487 - 1

I. ①文... II. ①郭... III. ①民主政治—研究—东亚
②文化史—研究—东亚 IV. ①D731.021②K31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3458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八辑 ·

文化与民主

郭定平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243,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487 - 1/D · 1770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编前语 /郭定平 1

跨国比较研究

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 /郭定平 7

民主化：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 /辛道轍 36

政治参与和政治平等新论：亚欧十七国(地区)的比较分析 /蒲岛郁夫 64

东亚与拉美民主信念的比较分析 /恒川惠市 鷲田任邦 96

东亚儒家社会的后现代价值观及其政治意义 /王正绪 114

东亚个案研究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以中国知识群体的“当代特质”及其
“介入机制”作为研究视角 /刘建军 134

香港的政治价值观与民主发展 /林蔚文 155

日本文化变迁与民主发展：经验与反思 /猪口孝 166

韩国国会的信任危机：民主巩固的阻力还是动力？ /朴赞郁 181

儒家文化与新加坡民主政治 /李 文 190

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多种族社会的竞争性发展主义

/约翰·沙拉瓦纳姆都(Johan Saravanamuttu) 罗国华(Francis Loh Kok Wah) 199

编 前 语

郭定平

文化与民主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在他们讨论和分析民主政治时,无不关注民主政体的精神问题、公民教育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基础问题。在当代政治学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论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政治学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尽管政治文化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人们对它的理解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相关研究精彩纷呈,但是自从阿尔蒙德和维巴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大规模的跨国政治文化调查研究并出版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首部经典著作《公民文化》以来,文化与民主的关系就成为了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推进,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迅猛增长;与此同时,民主的质量成为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因为一些新兴的民主体制不能良好和有效运转,甚至出现了不少民主崩溃的现象。如果说民主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战略和精英博弈的问题,那么民主体制的巩固和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民的价值观念紧密相关。这一现象迅速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并推动了民主政治转型研究中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与深化,甚至在90年代以来出现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新高潮。一方面,很多研究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学者把目光转向各个新兴民主国家的文化问题和公民的价值观念问题,研究人们的民主态度和民主信念,分析它们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及其与民主质量的关系。在80年代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之后,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发展的关系就成为新的热点,甚至出现了关于儒家民主和亚洲价值观的著名讨论。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把研究焦点投向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研究西方民主的文化基础和大众支持问题。罗伯特·帕特南跟踪研究意大利的地方政府改革并于1993年出版研究成果《使民主运转起来》,在比较分析意大利南北地方政府绩效的明显差异的同时,深入剖析了这种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全面阐述了著名的社会资本理论,有力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各种规模和不同层次的社会调查普遍展开,调查数据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深入分析,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这是由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英格尔哈特等人发起组织的大型跨国调查项目。该调查开始于1990年,并在1995—1997年、1999—2001年、2005—2006年实施了调查。目前该调查覆盖世界80多个国家,全球70%以上的人口。其次是2000年的亚欧价值观调查,覆盖亚欧18个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欧洲9个国家,亚洲7个国家、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由于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调查在中国大陆没有实施,因此数据缺失,研究者们只能对1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第三是世界各大洲的学者们联合实施的晴雨表调查,例如,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拉美晴雨表(LatinoBarometer)和亚洲晴雨表(AsiaBarometer)。其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亚洲晴雨表调查项目有两个,一个由台湾大学的朱云汉主持,另一个由东京大学的猪口孝主持,它们覆盖的范围大致相同,但有差别,问卷内容各有特色。猪口孝主持的“亚洲晴雨表”项目自2003年启动之后,每年在亚洲的不同国家实施调查,当时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基本上在每年的调查范围之内。

在此背景下,我们编辑了本辑《复旦政治学评论》,试图结合当代民主政治转型研究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前沿理论,利用世界范围特别是亚洲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资料,从比较的视野分析和探讨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问题。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跨国比较研究,包括全球范围的综合比较研究,东亚与欧洲、拉丁美洲的比较研究,东亚内部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二是东亚部分国家的个案研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与民主发展研究。郭定平的文章《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在努力超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从内源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变迁三个角度分析和解释了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内源性发展论强调东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赋予东亚民主政治以地域特色;创造性转化论注重吸纳外国发达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互动与有机结合,保证东亚民主具备先进政治文明的特质;适应性变迁论主张政治文化可以学习和塑造,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培养民主政治文化,体现东亚民主政治发展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三个方面同时并存,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东亚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和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该文力图为东亚政治

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美国密苏里大学的辛道辙长期研究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在《民主化: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中他通过考察发生在非洲、东亚、拉丁美洲和新欧洲(New Europe)的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和公民大众领域内的民主变革,提供了一个关于当前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全景描述。在回顾了先前关于制度民主与文化民主深度和广度层面上的研究成果之后,辛道辙运用实证数据和民意调查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四个地区的指标调查分析显示,其中三个地区的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着民众对民主需求不高的问题。基于这个发现,作者认为信奉民主为“城中唯一的游戏”(the only game in town)是通往大众民主化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

蒲岛郁夫的文章《政治参与和政治平等新论:亚欧十七国(地区)的比较分析》主要比较分析了亚洲与欧洲的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内涵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体系的核心要素,然而不平等的政治参与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且严重违背民主原则,对民主政治的稳定形成威胁。蒲岛郁夫运用亚欧调查的数据比较分析了亚欧17国中政治参与的状况,试图探讨平等的政治参与同民主政治稳定的关系。与先前认为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政治参与会对民主政治稳定产生负面效应的看法不同,作者在此项研究中发现,完全可以在降低政治参与差异水平的同时保持着政治稳定。

恒川惠市和鷲田任邦的文章《东亚与拉美民主信念的比较分析》则着重比较了东亚与拉美的民主信念问题。一个民主国家要想稳定持续就必须使得那些高度不满的公民能够信守民主制度。没有这种民主信念,民主制度将是不稳定的。即便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新兴民主体制也会因为公民的失望和动摇而陷入险境。该文首先根据“亚洲晴雨表调查”(AsiaBarometer)数据来测量几个亚洲国家的民主信念水平,然后通过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比较,阐明亚洲各国民众信念的特征。随后,作者再次通过与拉丁美洲的比较,分析了那些与亚洲民主信念相关联的因素。

王正绪的论文《东亚儒家社会的后现代价值观及其政治意义》研究了东亚的后现代价值观及其政治意义。他娴熟地运用现代统计技术分析亚洲晴雨表调查的相关数据,证明经济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正在改变东亚儒家社会的价值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人们从强调勤奋工作、取得成就等向强调生活质量(享受)、自我表达以及更加充实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种观念

变化的影响下,人们变得更加支持平等,对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也更加宽容。这些社会现代化后出现的价值观被称为“后现代”价值观。后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们在政治上更加活跃,表现在他们更加积极地争取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更加倾向于民主政府。同时,他们也更强烈地要求政府廉洁、奉行平等和包容的公共政策、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这些都意味着,随着中国等东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后现代价值观的加强,这一地区的人们会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要求政治向更加民主、政府更加廉洁有效、社会更加平等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方面,虽然研究者的视角各不相同,研究的具体对象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均关注文化变迁和民主政治发展,为我们展示了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化的生动画面。刘建军的长篇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以中国知识群体的“当代特质”及其“介入机制”作为研究视角》研究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变迁问题,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既表现出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传统的一种内在契合性,又表现为对现代社会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回应。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思潮既是中国近现代悬而未决的一些重大命题的遗留,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孕育出来的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导致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日益高涨的世俗化运动在消解国家权力和文化权力之距离的同时,也为不同政治思潮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在告别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一思维惯性之后,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共荣空间已经形成。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基本逻辑蕴涵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和广度对它所产生的规定性之中。作者认为政治思潮的多元并存与市场化导致的知识群体的分化密切相关。正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群体逐渐拥有了一份不同于传统和西方社会之知识分子传统的“当代特质”。总之,政治思潮的本质特征在于介入,因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指向不同,政治思潮的介入机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文章提出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实际上体现为三重面向: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以及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

香港大学林蔚文的论文《香港的政治价值观与民主发展》结合民主信念和亚洲价值观考察香港政治价值观的特征,重点关注民众对民主的态度、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角色、政治多元主义以及香港人对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程度。研究发现,香港人的民主信念是矛盾的。当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民主化、经济发展

与政府效率之间的矛盾时,人们并不总是认为民主是最合适的优先选择。因此,作者提出,解决在香港人中普遍盛行的关于民主、经济发展和效率之间内在关系上的矛盾心理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人们被赋予更多的权利,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加深对民主内在价值的理解,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层面也能施加实际的影响力,那么香港人的民主信念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日本著名政治学家猪口孝的论文《日本文化变迁与民主发展:经验与反思》通过论述长达五个世纪的文化变迁来对日本民主发展进行反思。作者认为,当能够鉴别外来因素对日本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能够鉴别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资本形成背后所潜在的文化因素,并将其与五个世纪里日本政治民主的发展相联系,那么日本文化变迁与民主发展的关系就变得相当清楚。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政治学家朴赞郁的论文《韩国国会的信任危机:民主巩固的阻力还是动力?》通过研究韩国国会的信任危机问题揭示了韩国民主政治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自1987年6月开始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以来,韩国的民主已经持续发展了二十余年,韩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但是,21世纪初期韩国国会陷入了严重的公众信任危机。很多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0%的公民还对国会抱有信心。公众信心的下降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对政党之间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家在议会政治中缺乏和解的能力感到悲观失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巩固不可能离开公民对代议机构的信任得以实现。为此,国会议员必须改变行为方式,以赢得民众对他们行为的赞赏。他们应当努力将政党转型为政策导向的、负责任的、内聚型的政党。同样,政党也应该调整自己的位置,尽可能建立跨党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李文的论文《儒家文化与新加坡民主政治》论述了新加坡民主政治的儒家文化根源。他认为,新加坡社群主义民主强调群体、政府与国家的重要性,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出发,奉行好政府主义,实施精英政治,限制结社与言论自由,强调互助与和谐。新加坡的民主政治与儒学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观念,“行仁政”学说,重视家庭关系的伦理观以及强调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的“天下观”之间具有内在传承关系。马来西亚的两位著名政治学家沙拉瓦纳姆都(Johan Saravanamuttu)、罗国华(Francis Loh Kok Wah)的论文《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多种族社会的竞争性发展主义》基于亚欧价值观调查项目对马来西亚人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状况,认为“发展主义”取向可以用来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研究发现,马来西亚人十分相信和信任国家能

力,这在文化上必然导致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型国家。只有“发展主义”能够解释马来西亚人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这反过来又阻碍了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进程。在政治行为方面,马来西亚人普遍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然而,仍然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玩忽职守提出严厉批评。或许,这正暗示着“新政治”已经在马来西亚生根发芽。马来西亚人是强烈的国家主义者,但同时也显示出浓厚的种族和宗教特征。从调查来看,马来西亚政治文化虽然具有参与性特征,但仍带有浓厚的发展主义和种族色彩。

本辑《复旦政治学评论》的编辑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当然首先是因为各位作者能够把他们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惠赐给我们,使得本辑内容能够较好演绎主题和深化主题。其次,在编辑的过程中,葛传红、赵晶、朱佳峰、朱哲莹、陈薇、汤波、赵银亮、臧璐杰、施丽丽等为我们提供了英文论文的翻译初稿,邹雷协助进行了校订。出版社编辑、学院评论编辑部的同仁对编辑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鼓励和宽容。在此特致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各位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2010年4月10日

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

郭定平

〔内容提要〕 在东亚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因为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长期的儒家文化传统,因此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就成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在努力超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本文从内源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变迁三个角度分析和解释了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内源性发展论强调东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赋予东亚民主政治以地域特色。创造性转化论注重吸纳外国发达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互动与有机结合,保证东亚民主具备先进政治文明的特质。适应性变迁论主张政治文化可以学习和塑造,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培养民主政治文化,体现东亚民主政治发展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三个方面同时并存,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东亚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和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与民主发展的关系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主题和重要内容,在 20 世纪后期民主转型浪潮的推动下此项研究更是高潮迭起,人才辈出,成果丰硕。战后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经济发展奇迹之后,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它们通过政治改革,推动政治转型,发展民主政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政治发展奇迹。虽然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具体时间上先后不一,经历的过程不尽相同,建立的体制参差不齐,但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东亚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因为实现民主转型的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均具有长期的儒家文化传统,因此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自然成为一个重大课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受到极大重视。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但是始终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些甚至大相径庭。本文旨在全面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的关系进行一些理论分析,试图建

* 本文系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东亚地区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致谢。

构一种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儒家文化与民主

在东亚儒家文化的悠久历史传统中原本没有西方的民主观念与理论,这一现象不仅毫不足怪,而且可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因为直到近代,东方与西方在毫无交流与沟通的情况下遵循不同的逻辑,沿着各自的轨迹,孕育和发展了迥然相异的政治文明。儒家文化中与西方民主思想最相似的莫过于民本思想,但是根据民主的最低限度的定义,一是统治者的权力需受宪法的限制,二是统治者必须依据宪法对人民负责,这两点无论是理论或事实,在民本思想的传统中都没有出现过。^①近代以降,西方文明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强力推动下开始向世界各地扩张;与此相比,东方文明在严重的内部衰败和外部冲击之下日渐没落。当西方列强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东亚各国大门之后,西方的器物、制度与思想观念开始流入东亚社会。在日本,最早谈到欧美议会制度的书是朽木昌纲从荷兰书籍中翻译、于1789年出版的《泰西舆地图说》;到了幕府末期,随着议会知识的普及,1816年发行了由日本人自己撰写的介绍立宪政体的小册子。^②1817年,中国两广总督蒋攸钰在向朝廷报告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谈到美国没有国主,只有头人,选举产生,四年一换。1819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编写了《地理便童略传》,在马六甲出版,书中比较具体介绍了英国国会两院以及国家大权三分的政治制度。^③在各种西方的思想观念之中,民主思想作为西方的主流价值之一迅速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蔓延,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东亚各国引进和传播西方民主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东亚传统思想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因此讨论的主题和焦点经常集中在东亚儒家文化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关系之上。从19世纪初期开始介绍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至今,此类讨论绵延不绝,各种论著汗牛充栋。概而言之,基本观点可以

① 韦政通:《中国的智慧——中西方伟大观念比较》,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7—38页。

② 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③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62—65页。

大致分为如下三类：^①

第一，儒家文化优越论。该派认为儒家文化不仅包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科学等积极价值，而且与西方的民主思想相比，东亚的儒家政治理想更高级、更优越。因此，如果要在东亚推行民主，必须大规模地普及儒家思想教育；如果要解决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的各种弊病和问题，儒家文化可以提供很大的启示和正确的指导。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生活上自有其民主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道就表现了民主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中国没有西方近代那样的民主，中国也不能发展西方那样的民主。这不仅因为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教育水平以及交通通讯设施等方面的落后，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与精神条件的不合，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较，显现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这就是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②忽视中国的文化精神，盲目模仿西方民主，唯有死路一条。根据梁漱溟的看法，中国的这种特殊文化精神是超越西方文化之上，因此无法改移而下，只能依据自身文化的特殊精神，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正因为如此，“中国今后而有前途，则其开出来的局面，不能不比他既往历史进一步，不能不视西洋近代史高一格。”^③蒋庆认为，东亚儒家政治文明追求的是一种王道理想，其根本是仁，具有非常深刻的政治智慧，正可对治西方政治文明中民主政治非道德性、平面性、横向性与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弊端。民主政治与王道理想相比，民主政治只相当于王道政治中的人道，只符合“天下归往”的含义，而不能上通天道、实现人与宇宙的和谐，故民主政治只处于王道政治的低级阶段，王道政治在理念上高于民主政治。因此，“东亚政治的当务之急即是复兴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文明”。^④

第二，儒家文化落后论。该派主张儒家思想根本上是反民主的，与西方政治传统中的民主思想相比，儒家思想保守落后，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因此

① 相关讨论可参见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11页；卢向国：《温情政治的乌托邦——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机理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0—316页。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50—252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06—407页。

③ 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载《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173页。

④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第384—395页。

只有全面批判和彻底抛弃儒家文化,才能发展民主政治和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在日本的文明开化与自由民权运动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判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倡言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一股潮流。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明确指出,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西洋文明处于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如果要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①加藤弘之虽然幼时受过儒学教育,但是后来接触洋学,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在日本明治初期以天赋人权论为基础,论述立宪主义的政治主张,对于推动文明开化和自由民权运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当代对儒家文化与民主关系问题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意见都认为儒家文化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亨廷顿甚至这样断言:“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传统的儒教要不民主、要么反民主的命题上持学术上的反对意见。”因为,“古典的中国儒教及其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流派以及在受到冲淡的日本都强调团体、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的权利存在的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的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教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在实践上,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②坚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不仅在西方比比皆是,就是在东亚各国也大有人在。曾任韩国驻华大使的著名儒家问题研究专家黄秉泰就认为,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文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了让人民群众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必须消除等级社会观念中的封建残余。在等级社会里,君子注定要治人并由人民供养,而人民则注定要侍候君子。在这方面,以君子和百姓分离的等级社会体制为基础的儒家文化正好是现代化的对立面。由于得到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家族社会的加强,儒学的贵族政治哲学一直抗拒导向民主化的任何内在动力。”^③因此,在他们看来,批判儒家文化,清算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是在东亚各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

①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8、11页。

②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64—365页。

③ 黄秉泰:《儒学与现代性——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82页。

第三，儒家文化与民主兼容调和论。该派认为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并不必然对立，也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讨论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时，不能简单笼统地肯定或否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应该正本清源，分析和研究儒家文化的来龙去脉，讨论儒家思想的各个不同方面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解和主张。儒家传统文化之中确实存在对民主不利的方面，但是，儒家传统文化之内也有不少民主的成分或趋向民主的因素。儒家传统的政治理想是德政礼治、内圣外王，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通过诚意、正心、修身使自己成为道德上的圣人，并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之后才能够获得领导人民的权力和责任。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狄百瑞在阐述孔子和他的教导时说：“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人们的领袖的人来说，并不是君子或贵族的世袭特权使他获得资格，而只有个人德行的品质才能博得尊敬，无论是一个统治者也好，还是一个人师也好。”^①刘述先曾言：“中国的精神传统不只有现代文明所不可磨灭的宝贵遗产，也含藏着科学民主思想发展的种子。”^②儒家的这些理想政治精神在东亚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它孕育了一些圣君贤相，创造了传统东亚的辉煌政治文明；另一方面，儒家的理想政治精神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常常被颠倒和歪曲，例如，统治者自命为道德导师，并通过国家机器对儒家伦理进行灌输，从而实现对民众的控制。这样，政治化的儒家就扭曲了儒家理想的和谐互惠关系，而使这种关系堕落为对权威的消极顺从。一些统治者有意利用儒家学说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使得儒家思想堕落和变质为统治者的护身符与被统治者的精神鸦片。随着东亚民主化的进展，对东亚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特性的分析也开始受到重视，甚至产生了“儒教民主主义”之类的概念。^③虽然“儒教民主主义”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在儒家文化之中确实包含了民主主义的内容，或者说至少存在着与民主主义相契合、相共通的因素，而这正是发展和完善东亚民主政治、建设现代东亚政治文明的一个良好基础和有利条件。在东亚政治发展逐渐从权威统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今后东亚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就是必须在继承东亚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吸收和

① 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何兆武、何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页。

② 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③ 猪口孝：「『アジアの価値』とアジアの民主主義」、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百三十四期、1997年12月、第5页。

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的有益成果和成功经验,逐渐发展和创造出适应东亚历史和现实并具有东亚特色的民主政治的价值、文化和哲学。

虽然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具体时间上先后不一,所建立的民主体制也不尽相同,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它们在民主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1986 年 2 月菲律宾在强大的人民力量的推动下结束了马科斯长达 21 年的独裁统治,恢复了民主制度。^①1987 年 6 月 29 日卢泰愚发表历史性的民主化宣言和同年 12 月 12 日国会通过新宪法,建立第六共和国,韩国开始从过去的军人权威统治向新的民主政治转型。1992 年金泳三上台以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以推动韩国政治转型为己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1998 年金大中竞选获胜后就任总统,更是标志着韩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②从 1986 年 3 月国民党推动“政治革新”开始,台湾地区政治逐步发生明显而深刻的转变,国民党维持多年的权威统治走向终结,并开始向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过渡。^③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各种社会、政治问题也相继凸显。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以后,政治丑闻的接连曝光,使自民党的一党执政及其派阀政治受到广泛怀疑和尖锐批评,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迅速高涨。在 1993 年 7 月 18 日举行的第四十届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执政的自民党只获得众议院 511 议席中的 223 席,远远低于半数。由于在大选中获得 48 议席的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最终决定与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及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五党一派组成联合政权,自民党结束了一党长期执政 38 年的历史,第一次成为在野党。自民党一党长期政权的终结和细川护熙联合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重大转折。^④

亨廷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曾经提出:“经济成长和亚洲文化之间的互动似乎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东亚式的民主制度。到 1990 年,除菲律宾外,没有一个东亚国家出现过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个政党的政府把权力移交给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另一个政党的政府。”^⑤他认为,日本式的一党独大体制,似乎正在向

① 约翰·芬斯顿主编:《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张锡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32—233 页。

② 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38—140 页。

③ 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九州出版社,2002 年,第 4—5 页。

④ 郭定平:《论战后日本政治多元化》,《日本学刊》1994 年第 4 期,第 28—30 页。

⑤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368 页。

亚洲的其他地方扩散。1990年东亚的一党独大体制横跨民主与权威的两端，日本是一端，印度尼西亚是另一端，他们之间大致的排名次序是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样一种体制可以满足民主的正式要求，但是它显然不同于西方流行的那种民主体制。东亚的一党独大体制似乎存在着权力竞争，但不存在着权力更迭，所有的人可以参与选举，但只有那些“主流”政党中的人才能获选公职。这是没有权力交替的民主。亨廷顿进一步强调说：“这种政治体制代表着用西方的民主实践来服务于东亚或儒教的政治价值。民主制度的作用目的不是来促进西方竞争和变化的价值观，而是促进和谐与稳定的儒教价值观。”^①如果说亨廷顿的说法在1990年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的话，那么，在1993年日本自由民主党的一党独大体制崩溃以后，进而在1998年韩国金大中领导的反对党在大选中获胜并上台执政、2000年中国台湾的民主进步党候选人陈水扁击败国民党候选人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这种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说在过去的将近两个世纪中关于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儒家政治理想与民主政治理想究竟孰优孰劣以及儒家文化是否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之上的话，那么在东亚民主政治转型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民主政治得到稳步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关于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的讨论就必须重点解释东亚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动因，说明儒家文化为何以及如何促进和推动了东亚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下文试图从内源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变迁三个不同的角度为东亚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二、内源性发展论

东亚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一个解释就是它植根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种内源性发展。内源性发展是在反思过去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发展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压力之下被迫开启的，因此现代化理论就很自然地把所有社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两

^①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70页。